

朱彦民 以笔墨传甲骨文

本报记者 张洁



朱彦民

1964年出生,河南人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甲骨文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,出版《商族的起源、迁徙与发展》《殷墟都城探论》《甲骨文书法探微》等专著。

在安阳师范学院求学
天高地阔研究甲骨文

不久前,“契文传道——朱彦民甲骨文书法展”在南开大学举行。此次展览由范曾先生担任艺术总监,朱彦民以60幅形神兼备的甲骨文书法作品,传播古文字知识,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朱彦民自安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,即开始了对甲骨文的研究,随后在郑州大学和南开大学攻读历史专业,先后获得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。通过书法这一艺术形式,他将甲骨文的精髓传达给大众,被誉为甲骨学研究“九新秀”之一。

年轻时,朱彦民在安阳师范学院上大学。师范生要精通“三字一话”,即粉笔字、毛笔字、钢笔字及普通话。他喜欢钢笔书法,连续三年在校内“三字一话”比赛中夺冠,为他走上书法之路增添了信心。

“书法老师是一位古典文学学者,他鼓励我们临摹字帖,打下书法基础。”朱彦民说,每次交完作业,老师会用红墨水标注出写得好的地方,细致到笔画的移动、结构的调整,几乎每页纸上都布满圈点批注。

1984年,朱彦民上大二,参加了“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硬笔书法大赛”,荣获一等奖。“硬笔书法家庞中华先生是颁奖嘉宾,亲自为我颁奖。”获奖的消息在安阳师范学院引起轰动,校长在全校大会上专门提及此事,称赞朱彦民为校争光。之后,他又在安阳市群艺馆举办的年度书法展览中,以一幅毛笔行书作品获一等奖。他想:“我以后可以搞书法了。”

甲骨文最早在安阳殷墟发现,所以称为殷墟文字。由于对书法有着浓厚的兴趣,又身处安阳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,朱彦民自然而然地接触到了甲骨文。

他回忆:“那时候学甲骨文的人不多,大家都有一种焦虑感——这么重要的传统文化,没有人研究怎么行?”安阳市还没有像样的甲骨文研究专家,年轻专家更为稀缺,学校就自己培养,成立了殷商文化研究班,从中文和历史两个专业中挑选了六名学生,朱彦民是其中之一,他的兴趣逐渐从艺术性的书法转向了学术性的甲骨文研究。

朱彦民首篇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题目为《甲骨非卜辞契刻者》。这里的贞人,指的是古代周人所说的卜师,其中“贞”字由“贝”(实际是三足鼎形象)和上方的“卜”(表示占卜)组成,贞人意指进行占卜之人。通过研究,他发现贞人是在社会中地位极高的贵族,上知天文、下晓地理,擅长通过占卜预测吉凶祸福。贞人要有智慧、有学识,绝非普通人所能胜任。

“贞人是占卜活动中的核心,是占卜团队的领导者,而具体执行刻写工作的人,相当于现在我们说的写手,负责将占卜结果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。这种分工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的高度认可。”朱彦民说。

前不久,朱彦民受邀参加在北京雁栖湖召开的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,提交的论文是《从甲骨文“贞”字到周易“贞”字——近世以来关于这个占卜术语阐释的追踪》,也是他近年甲骨文研究的成果之一。分享观点时,他说:

“甲骨文的研究难度何在?这是一种早期的文字形式,随着社会变迁,许多象形文字的含义已与今日大相径庭。古人通过象形创造文字来描述生活,试图理解这些不再使用的象形文字,并将其与现代汉字对应起来,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”

目前,约有1500个常用甲骨文字已被解读,但仍近三分之二的字数约3000字尚未破译。朱彦民说,数字、自然现象如山川、日月星辰等名词字眼相对容易考证,而动词及由多个象形元素组合而成的会意字,不太容易弄明白。当然,这并不妨碍现代人对甲骨卜辞的理解。甲骨作为占卜记录,每一条卜辞都详细记载了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。即使某些字无法直接识别,仍能根据上下文推断其大致含义。朱彦民举例说:“卜辞中提到商王前往某地狩猎,即我们不知道地名,不知道在哪里,不知道相当于后世哪个字,也能从整体上把握句子的含义。这些未解之谜更像生僻字,与现代生活联系不大,但我们提供了窥视古代社会文化的窗口。”

来南开大学读博士
有幸结识多位大师

甲骨文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根源,就连自然科学的某些方面也有所体现。“古人重视天文历法,因为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成功与否。此外,甲骨文中还蕴含着数学和物理学的知识,尽管处于原始阶段,却也展示了古人的智慧。”在朱彦民看来,研究甲骨文,一旦深入其中,便会乐趣无穷。

朱彦民到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,导师是王玉哲先生。王玉哲是著名先秦史学家,曾就读于北京大学,后转至西南联合大学读研究生,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,更是品德高尚、为人谦和的长者。

“与先生相处,感受到如沐春风般的舒适。先生在我心中,永远是慈祥而又平易近人的。”除了王先生任主导师外,还有刘泽华、朱凤瀚、王连生等多位知名学者担任导师指导小组的副导师,共同组成了学术团队。如今回想起来,朱彦民觉得,那段时光是自己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。

王玉哲先生开设了《音韵学与古史研究》课程。音韵学属于口耳之学,教与学的难度都很大,需要深厚的语言功底,才能掌握。通过王先生的悉心教导以及他对西南联大往事的精彩讲述,使得原本枯燥乏味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起来。他以自己年轻时的求学故事,激励学生们要追求真理,这种精神感染了朱彦民,让他更坚定了从事先秦史研究的决心。

基于与导师的讨论,并结合个人兴趣,朱彦民选择了“商族的起源、迁徙与发展”作为研究方向。商族的起源曾有三十多种不同理论,作为早期三大部族之一,商族与夏族、周族一同逐渐掌握了中原统治权,建立王朝,开启了国家制度。朱彦民经过对甲骨文资料及商朝早期遗址考古发现的分析,结合文献,提出新观点:作为早期游牧民族的商族来自北方,具体而言,是位于燕山以南的渤海湾地区。

王玉哲先生曾发表《商族起源探析》,认为商族是从山东半岛来的,属东夷部族。朱彦民在郑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,他的硕士生导师李民教授也研究过商族起源,主张商族来自山西晋南。朱彦民感到困惑和苦恼。通常情况下,学生会遵循导师的意见进行补充论证,但他却与导师、博导的观点都截然不同。

当他将论文初稿提交给王玉哲先生审阅时,王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,认为这是一个新颖且富有创见的观点,更符合后来出土的考古资料。王先生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以供参考,李民教授也对朱彦民的研究表示支持,他强调学术问题应当开放讨论,真理往往愈辩愈明。这种学术自由和开放的氛围鼓舞了朱彦民,他撰写的专著《商族的起源、迁徙与发展》出版后,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。这部作品为商族历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,彰显了学术交流与争鸣的益处。

在南开大学读书时,朱彦民获知书画大师范曾先生在南开,便向王玉哲先生询问,自己能否前去拜访?王先生欣然应允,拿出求学时在云南曲靖购得、珍藏六十余年的“小爨碑”拓本,交由朱彦民,转送范曾先生。

当范曾先生目睹这份心意时,激动之情溢于言表,请朱彦民转达,自己会将王玉哲先生的深情厚谊铭记于心,并说:“从今后,无论你何时来,我都将敞开大门,热烈欢迎。”经过几年的交往,朱彦民拜入范曾先生门下。范曾先生对他的书法评价很高,说他的字“飘逸有出尘之致,非时流逐怪追异者可同年而语”。

将甲骨文变为书法
探寻中华传统文化

与一般甲骨文研究者不同,朱彦民除了掌握甲骨文字义、训读等专业外,甲骨卜辞史料分析之外,还擅长从书法角度做研究,这正是他的优势——能够解读、欣赏这种古老的文字之美。他说:“甲骨文之所以美观且受人重视,是因为它代表了象形文字最具表现力的时期,可视为书法

艺术的源头。”

他将这种古老文字用毛笔重新诠释,这是传承文化的方式,是当代学者的责任。他感慨:“早期学者如‘甲骨四堂’(罗振玉、王国维、郭沫若、董作宾),他们都是国学大师,拥有深厚的文化功底,也都是功力深湛的大书法家。后来的许多甲骨文研究者,虽然学问深厚,但在书法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,拿起毛笔书写甲骨文的学者越来越少了。”

甲骨文深奥且鲜为人知,将其转化为书法作品,更易于被大众接受。朱彦民利用笔墨表现甲骨文,创造出独特的甲骨文书法,成为传播这一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。

书写出来的甲骨文,是该贴近原始形态,还是注重艺术价值?经过长期实践与思考,朱彦民得出结论——两者间需要找到平衡点。一方面,要保留甲骨文刻划所带来的质感;另一方面,又不能失去书法本身流畅的美感。早期书写者,如罗振玉先生采用小篆技法,强调线条均匀对称;天津学者王襄先生偏好使用金文风格,追求稳重厚实的效果;南京大学教授胡光炜(胡小石)先生借鉴了魏碑的特点。朱彦民则倾向于运用行书笔法,这样既能快速捕捉到刀锋锐利的感觉,又能展现出刚劲有力的视觉效果。

2014年,朱彦民撰写了《甲骨文书法探微》,探讨甲骨文书法的细微之处,揭示笔法的精妙所在。范曾先生为该书作序,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颇受欢迎,数次加印。

在南开大学,朱彦民开设了《中国书法史》课程。这门课是书法艺术的一部分,也与历史紧密相连。教学过程中他感觉到,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日渐浓厚。最初《中国书法史》只是文博专业学生的必修课,随着越来越多非本专业学生来旁听,甚至不少退休教师也来听课,这门课逐渐发展成全校的公共选修课,被评为校级优秀课程。

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爱书法,朱彦民在设计课时特别注重视觉效果,使用了大量图片,也将实物、复制品带到课堂上。例如,在讲解“甲骨文”这一章节时,他展示了自己收藏的一些高质量摹本。当同学们亲眼见到这些古老的文字,对传统文化便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。

从2008年至2018年,朱彦民担任天津市国学研究会副会长、会长。他认识到:我们的祖先在困境中孕育出深邃的思想,历经岁月洗礼流传至今,如果我们忽视了这珍贵的文化遗产,又该向何处探寻智慧的本源呢?

回想当初由中文专业转向历史专业,有人质疑他,学历史有何用?他的答案是:这种观点忽略了历史与文化的深层价值——历史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,但在关键时刻却能提供行为范式、决策思维,其影响力不容小觑。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,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人修养,净化社会风气,更能为我们带来强大的精神动力。

朱彦民访谈
读书并不是表面功夫
而要形成自己的观点

记者:在您心目中是如何定义甲骨文的?

朱彦民:甲骨文是目前公认的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,提供了商代最原始、最真实的史实信息,延伸了中华文明史,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,也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。

记者:学者往往以做学问、搞研究为主,您为什么愿意花费时间、精力去讲书法、讲国学?

朱彦民: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功的学者,因为我浪费了不少时间。不过,这种所谓的浪费,并非完全没有收获。比如,我的同事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深耕细作,成果更为纯粹,而我原本是个书呆子,阴差阳错走上了社会化程度很高的道路,这与我潜心研究学问、培养学生的初衷不太一样。也许是出于兴趣广泛,再加上是个好性格,不好意思拒绝他人的请求,所以才越走越远。在此我想寄语年轻人和在校学生,无论是中学生、大学生还是研究生,都应充分利用在学校的时间学习。一旦走向社会,承担各种工作,再捧起书本时,可能也看不了几页了。

记者:从技术角度来说,互联网时代的学习、研究跟过去不太一样了,您觉得传统的方式还有存在的意义吗?

朱彦民:现在的条件比过去进步了很多,学术材料更多,读书更方便了。记得我读博士的时候,写博士论文要用钢笔抄写卡片,学院里给每个博士生发一箱卡片纸,至今我还保留着一部分。现在的学者太幸福了,甚至不用买书,都是电子书。但要真正读书,光靠电子书可能还不行。比如搞历史研究,要读《史记》《左传》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论语》等原典,纸质书并没有过时,它有一种特殊的质感,整体性更强,电子书有时候容易脱离语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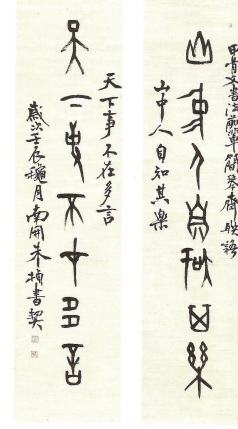
记者:手机将阅读变成了“碎片化”,读纸质书还是挺奢侈的事吧?

朱彦民:尽管科技进步为我们提供了更便捷的阅读方式和检索手段,但手捧一本线装书,旁边燃一炷香,沉浸在古书的世界,仍是令人向往的。读书人需要静下心来,认真研读一些书籍,不被现代社会的浮躁干扰。如今生活节奏加快,竞争压力和焦虑情绪也随之增加,人们真正能静下心来深入阅读的机会越来越少。我们必须坚持一种专注的精神,专心致志地读一些书,要知道,读书并不是表面功夫,而是为了解惑,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。

记者:您对年轻学者有哪些建议?

朱彦民: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是少年,有很多事情要干还没干,很多书要读还没读,不知不觉,已经到了花甲之年。岁月不待人,时间紧迫,所以,我常对我的学生说,一定要珍惜时间。人的一生不过百年光阴,读书时间已经用了一二十年,等学业有成,已近不惑之年。时间的把握至关重要。

(图片由朱彦民提供)



朱彦民甲骨文
书法作品

讲述

传承乡土文化的年轻人 静海故事多



李佳阳

口述 李佳阳 采写 孙瑜

生于1989年的李佳阳,在乡土文化传承和推广领域已是一名“老兵”。他参与搜寻保护过二十多块古碑刻,发现过多处乡镇历史遗迹,设计农耕文化园,参与筹建纪念馆,挖掘整理地方文献,组织口述史团队,并通过新媒体持续以恒地讲述静海故事……这一切都体现了他对故乡大地的热爱,他的内心涌动着浓浓的乡土情怀。

与老人交友
讲静海记忆

我出生在静海区杨成庄董庄寨村。家族的老人说,我们是明成祖永

乐二年(1404年)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来的。我小时候常跟奶奶做伴,没完没了地问她问题。上初中时有历史课,有一次考试让我记忆犹新——全班四十多个同学,只有两个人及格,我是其一,考了93分。我特别喜欢历史,也慢慢迷上了古钱币。听小伙伴说,附近村子有古墓,放假时我们便结伴骑车前往。那块地正在施工,我拿着铁叉子乱挖,还真刨出了几枚“乾隆通宝”。

2015年,我第一次参加“天津记忆”团队的活动,受到他们的启发,成立了“静海记忆杨聊群”,分享静海的历史、人文信息。

我有一个公众号,名为“我的静海”。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?因为我想表达几层意思,我的静海,也是你的静海,是我们大家的静海。

2020年,电影《八百》上映。这部电影讲述了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故事,营长杨瑞符是静海人,但其他信息不详。我在群里发出疑问,得到群友们的回复,说杨瑞符住在西翟庄镇东翟庄村,甚至把他堂孙的电话号码都发给我了。我把这些信息整理出来,包括杨瑞符的生平、家乡情况、家谱等,刊发在公众号上,点击量非常高,吸引了各路媒体。

我们去拜访杨瑞符的堂孙,看到了杨瑞符的遗物——一个精致的瓷质小酒杯。后来我跟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馆长联系过,馆长问我:“那个酒杯能不能捐赠给我们?”但又说:“还是留在静海比较好,可以建一座杨瑞符纪念馆。”

2022年,建西塘庄园园文化墙,得知《静海年鉴》有一年的封面用了《浣园图》,作者是曹官庄人陈加福,我们想用这幅画,需要授权。我一大早去了曹官庄。村里人说,有这个人,但早就搬到静海火车站附近的楼房了,也不知道联系电话。我直接去了火车站,在车站后面的小路上转悠,走着走着碰到一位老人,戴着帽子,拄着拐棍。我跟他打听:“您知道这附近住着一位叫陈加福的老人吗?”他愣了一下,问我:“你找他干什么?”我如实相告。他说:“我就是陈加福。”老人带我回家,把压箱底儿的十几米长卷《浣园图》拿出来给我看,又送给我一幅他的画。我觉得特别幸运,也特别感动。

我的经验是,与当地老人攀谈,自己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,包括历史、地理、人文的知识。比如对方说起一个地方,或某件事,你能马上反应过来,顺着他的话聊几句,就能引起共

鸣,激起他的表达欲,给你讲得更多、更细致。这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。现在我无论到哪个村,和老人交流时,给他垫两句话,就能把他一肚子的话引出来。换成跟年轻人交流,反而没那么多话题,没有兴奋点了。

寻找古碑刻
保存信息源

在历史长河中,很多老建筑因各种原因被毁,消失,还好留下了碑刻记载,为研究者提供了原始信息。所以我认为,碑刻的研究非常重要,同时我们也保护了很多险些被当作建筑垃圾处理的古石碑。

2015年,静海文庙遗址拆迁建住宅楼,挖出文庙的地基,有半块石碑以及一个碑帽。我得到消息后,联系文物部门一起过去,把石碑和碑帽运到书画院,保存起来。后来我发现,碑帽与静海碑林里的一块乾隆年间的石碑恰好相符。再加上以前静海文庙遗址留下的石碑,一共七块,我考证碑文内容,编成了一本小册子。

2017年,有人给我发来一张照片,是一块石碑,他讲了这块石碑的来历。上世纪90年代,某村建厂挖地基,刨出很多花瓶罐罐,也有石碑。那时人们的人文意识不强,有一个老人,捡走了一块石碑,放到打谷场,准备垒围墙。后来,老人的儿子发现这块石碑上有文字,觉得也许能卖点钱,便把石碑抱回了家。我通过照片看到石碑上的文字,有点儿激动,赶紧开车过去,量尺寸、拍照。这块石碑是隋朝的,碑文上有“章武平舒人”等字迹。静海古称“东平舒县”,这块石碑是历史佐证。

后来,那户人家想卖掉石碑,但卖不上价。我们团队成员找到他们村的书记,连劝带吓,把石碑接住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文旅部门出面协调,以“保管费”的名义收下石碑。如今这块石碑存放在文化馆。

2019年,有人在“静海记忆杨聊群”群里说,子牙镇三呼庄搬迁,在一个大水坑旁边发现了一块古碑。正值雨季,天气预报说后天有大到暴雨,我担心石碑被淹没,于是跟静海区教育博物馆的周老师商定后,次日进村寻古碑。三呼庄面积比较大,村周围分布着八九个大大小小的坑塘。我们从村东南口进去,一个坑一个坑地找。坑塘边多是村民自留的菜地,围着矮篱笆,总有村民盘问,我们便耐心解释。找了半天没找到,正要放弃,无意间朝一个坑塘瞥了一眼,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,石碑就在那儿!坑塘不深,但都是泥炭,我们找来些破木板垫在脚下,慢慢走过去。到近前细看碑文,依稀辨认出文字是“报恩寺重修碑记”,镌刻于明正德五年(1510年),撰文者为静海进士宋镛。这块古碑被运到静海碑林,得到妥善保管。

拍摄短视频
聊一聊乡土

“静海记忆”是“天津记忆”的衍生,“静海记忆”团队是在“天津记忆”团队的影响下成立的。我们每个成员都是自费,组织活动时吃饭、开车,或外出游学,都要自己花钱。好在外界对我们的认同度逐渐提高,支持我们的人越来越多,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在保护文化遗产,愿意关注我们,为我们点赞。

谈到文化遗产保护,市区和乡村的环境,现状都不一样。市区比较集中,

主要是小洋楼、老建筑;乡村地域广,参与者的专业知识也不足。我想通过努力去影响更多的人,让这件事深入人心,也希望形成创新的、适合乡村的观念、意识和方法。

我们团队有一个“保留节目”,就是每年春节时,正月初四或初五,做一次静海祠堂巡礼,已坚持了七年。我安排路线,比如在运河沿线、子牙河沿线行走,与当地的家族交流。关注家族文化、传统文化的人都可以参与,大家一起交流,好多祠堂、家谱的资料也能共享。

新媒体时代就应该引入新工具。我在抖音平台的账号是“静海文博人李佳阳”,目的就是宣传咱们静海的历史文化、乡土文化。拍摄这些短视频,并没有提前写文稿,总是走到一个地方,就想到一个点,直接开口,即兴发挥。有可能开机前什么都没想好,开机后突然想到了,对我是一种锻炼。这些短视频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别人,不仅当地人能看到,全国网友也都能看到。

我做这件事属于抛砖引玉,抛出一个话题,大家畅所欲言。现在静海的好多地方,比如独流镇、王口镇、唐官屯镇等,都有人以地方文史为素材,介绍风土人情。有配音的,有自己出镜的,甚至有航拍的。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,一群人的力量是无限的,把一块石头丢到水里,一定会泛起层层涟漪。

接下来我准备把我的短视频和公众号文章编辑成文字,出一本主题为《静海故事多》的书。还想做一系列短视频,每天一期,连续365天,讲静海大地上的人文记忆。期待静海人能更了解静海,为家乡喝彩,也期待更多的人爱上静海,到静海来走走看看,或留下来工作、生活。我的动力来自热爱,如果能落地形成小小的成果,那会是我最大的幸福。